

# 日本侵華內幕 (一)

## 田中內閣與關東軍

森島守人著。陳鵬仁譯著

### 改採強硬外交政策

一九二七年三月中旬，若槻（禮次郎）內閣因爲全國性金融恐慌問題而提出總辭職，繼而成以田中義一上將爲首相的政友會內閣。新內閣於三月二十一日決定有關延期償付的緊急敕令案，風頭十足地踏出其第一步。但人們的期待，對華外交尤其是對滿政策的改進，實遠比金融財政政策爲大。（譯註一）

當時，不大清楚國際情勢，而祇懂得稱讚講硬話者的日本國民，因爲南京事件（譯註二）活生生的回憶，和受到由滿洲方面接二連三地傳出排日事件報導的刺激，便視幣原（重喜郎）外交爲軟弱和一邊倒。這時，新誕生的田中內閣，由首相自兼外相，起用「中國通」的實力者森恪爲政務次官，山本條太郎和松岡洋石爲滿鐵的正副社長；同年六月，召集派駐中國各地陸軍、海軍、外務三省的主要負責人到東京，舉行所謂東方會議。爾後不久，更特派政務次官森恪到大連開會，因此人們以爲滿蒙政策將有一大轉變，並歌頌田中外交是由消極和軟弱的幣原外交，而轉變

爲積極和強硬的外交。

東方、大連兩個會議的內幕雖然不得而知，但從田中、森恪兩個人的經歷和爲人來判斷，則很容易窺悉新內閣的根本方針之在於推行大陸政策。加以幣原時代健將之一的次官出淵（勝次）和亞細局長木村（銳市）之被外放，更表明了田中內閣要推展對華侵略外交的意圖。

如果綜合東方會議所公開發表的文件，和國會的討論，田中內閣所標榜之增進中日的親善關係，機會均等，遵守門戶開放主義及不干涉內政的原則，跟歷代的對華外交可以說是大同小異。亦即田中外交的特色是，爲維護日本在華權益，以積極手段爲方針；對於滿蒙，不但要維護既得權益，而且要保持滿蒙一體的所謂平靖。換句話說，它以絕對確保治安，將滿蒙截然由中國本土分離；惟以滿蒙事實上的權力者作折衝對象爲其方針。

### 宣言「保護」在華權益

第一、爲維護日本權益，要訴諸於積極手段的方針，於一九二七年五月到翌年五月的具體化

行動，便是先後兩次的出兵山東。當時，日本國內有一部份人認爲應將日僑暫時撤退到安全地帶，外務省內部在大體上反對出兵；首相本身對出兵也不大積極；但政友會內部却考慮南京事件對國內的影響而堅決主張出兵。急進的森次官更與陸軍的一些份子呼應，不顧一切的反對，而做了出兵的決定。

出兵的結果，阻礙了蔣介石麾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徒助長整個中國的抗日風潮；特別是第二次出兵的時候，在濟南竟引起大規模的武力衝突。由此，它不但沒有達到在當地保護日僑的主要目的，而且產生許多日僑的犧牲者，更爲中日關係留下永遠解不開的後遺症。而在出兵的主要動機之來自政友會的對內政策這一點，它充分說明了政略出兵的危險性。

### 出兵山東阻撓北伐

第二、關於重現維持滿蒙的治安，並非田中內閣獨特的方針。歷代內閣不必說，連被目爲軟弱的幣原外交也沒有輕視過它。俄日戰爭後，在北京召開的中日善後會議席上，日本全權代表小村（

壽太郎)曾經提出這個問題,討論結果,對「關於在滿洲改善設施和確保治安的保障」,雖然沒有寫在條約裡,但却以兩國全權代表署名、簽訂的紀錄方式,獲得實質上與條約同樣的效果。徵諸其他各國的歷史,也有許多重視隣接地域之治安的類似例子。譬如美國在威爾遜總統時代,為維護其國家的利益,曾經出兵過墨西哥。這種措施,在國際法上叫做「干涉」(intervention),為國際法所容許;但田中內閣的方針,是否屬於這個範疇,實不無疑問。

在「干涉」的名目之下所行的出兵,本來應該是隨其情勢臨機所採取的措施;但田中內閣却自始就以例外措施之「出兵他國領土」為其外交上的原則。換言之,它以日本的責任和實力,來確保滿蒙的治安為方針,因此也就以干涉人家內政為其前提。這等於說,田中外交事先宣言,並不以維護個別的權益為滿足,而以滿蒙的平靖亦即以確保其穩定為根本方針。所以縱令由於中國內政上的理由,也不容許滿蒙的秩序陷於混亂;而有這種可能性時,日本將隨時出兵。

### 教唆滿蒙分離獨立

現在就幣原外交和田中外交,具體地分別予以探討。一九二五年秋季,郭松齡反叛張作霖的時候,日本國內,由於對於張作霖排日態度的反感,有人主張支持郭松齡;但包括滿洲當地大多數日本人還是贊成幫助張作霖。可是,基於不干涉內政的原則,幣原外相堅決反對出兵。迨至由於郭部的進擊,滿鐵線及其附屬地面臨危險時

,纔令關東軍司令官白川(義則)對交戰中的雙方提出警告,不得在滿鐵附屬地兩側和鐵路終點二十華里以內有戰鬥行為,並禁止可能擾亂附屬地治安的軍事行動。

但是,田中外交採取了與幣原外交完全相反的政策。亦即一九二八年春天,張作霖要撤出北京之際,田中政權發表聲明,其目的在於「禍亂將及於滿洲時,(日本)將採取適切而有效的措施」。松岡副社長滿口稱讚田中外交,他說;幣原外相時代,日本在滿蒙的權益祇是點和線,跟田中內閣的方針比較,其範圍、意義和實質,乃有天淵之別。田中內閣的方針,即是向全世界表明,要維持滿蒙全境的治安,不問來自其內外,絕不容許滿蒙的秩序有所混亂的「決心」。

第三個特色是把滿蒙從中國本土分離,俾拒南京政府之介入,亦可以說是滿蒙分離政策。它的目的是,國民黨之統一中國本土祇有容忍,但東三省一定要置於張作霖的勢力之下,以便在張作霖之範圍內擴大日本的權益。它的用意是,否認南京政府對滿蒙的外交權,和防止國民黨插足東三省。

東三省原是中國的一部份,但事實上其內政、外交都外於中國本土的支配,形同半獨立天地的時代。具有欲稱霸中原之野心的張作霖,在滿洲確立其地盤之後,曾經兩度大事進軍京津方面;雖然敗於內戰,撤回滿洲,却聲明「保境安民」,宣佈滿洲的獨立。此外,列國之中,也有過應該與中央政府簽訂的國際協定,却跟地方政府締訂的例子。

一九二六年,蔣介石先生統率的北伐軍進擊

漢口,惟因共產黨的倡亂,蔣先生曾一度訪問日本。這時,成立於漢口的武漢政府,不過是一個地方政權,沒有獲得列國的承認;但為了維護長江一帶的權益,英國曾與武漢政府締結歸還漢口和九江英國租界的協定,是即所謂「陳友仁·奧馬列協定」。又蘇聯於一九二五年,跟北京政府簽訂有關善後處理中東鐵路的協定,與此同時也跟東三省政權締訂幾乎同樣內容的所謂「奉俄協定」。華盛頓會議時,法國全權代表白里安曾經發問「何謂中國?」而馳名;實際上,就是張作霖遣派東三省代表前往了華盛頓。

但是,這些事例,畢竟是基於中國內政所採取的例外措施,而田中外交却在這方面倒行逆施,把例外措施當做滿蒙政策上的原則和準繩。同時,其最大的錯誤,是在張作霖作古,張學良當權,東三省與中國本土合為一體以後,仍然要強行滿蒙分離政策這件事。

### 田中奏摺真偽存疑

自一九二九年以來,田中外交在海外廣泛地流傳的所謂田中覺書(即田中奏摺一譯者),時至今日(本文執筆於一九四九年一譯者),大家還都把它信以為真。有人說,這是田中上將從歐洲旅行回國後,向日皇所上的報告,也有人認為它是東方會議的決定。總之,這個覺書所揭示的征服滿蒙,稱霸中國,從西伯利亞發展到南洋等一連串的所謂世界政策,跟自一九一八事變到太平洋戰爭的演變太符合了;所以人們都相信田中覺書的存在。

可是如果仔細檢討田中覺書的內容，我們便可以發現它把田中上將的旅行非律賓誤為旅行歐洲，將已經去世的重臣拉出來當活見證人，而且奏文的形式也不對；從此種種，當可斷定其為偽文書。日本政府雖然一再乘機否定，但終於未能消除內外人士的疑惑。

一九四六年七月，在東京市谷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前首相岡田（啓介）作證說，田中覺書是偽文件；我也於八月一日被傳作證人時，在炸死張作霖事件和有關九一八事變的反對詢問中，我也獲得作證的機會。作證時，我本來想順便說明田中覺書是怎樣流傳出來的。惟檢察官提出抗議說，這乃屬於我口供書範圍以外的事；因此我遂不得不停止發言。

一九二九年秋季，田中內閣提出總辭職以後，在京都召開了泛太平洋會議，松岡洋右等人以委員身份出席，並曾有過很激烈的論戰場面。在會議期間，中國方面的一位委員擬提出上述的覺書，而與日方委員小村俊三郎（「讀賣新聞」的客座，是位中國通的自由主義者）談及。小村與亞細亞局長有田八郎商量結果，一致認為，還是令對方在正式會議席上提出，以便把它批評得體無完膚。惟不知道什麼差錯，中國委員沒有在會議上提出來，而直接向記者團發表。這樣一下子電報海外，從而成為世界性的文書。這個文書的來源，至今不明；不過，如果根據有關東方會議的新聞報導，要寫出這種東西是很容易的。因此我認為，這不是日本浪人杜撰賣給中國的，就是中國人自己寫成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判決書

裡，從沒有引用過這個覺書，應該算是消除了人們長年的疑惑。

### 滿鐵總裁包藏禍心

田中內閣的滿蒙政策，由於其本質上的缺陷，發生張作霖之橫死和新主角張學良的上場，在未具體化之前，內閣本身就垮了臺。在其任期中所實行的，是不必跟中國折衝，片面進行之滿洲重要產業的創設和擴張，可以說都是山本總裁的功勞。

當時，起用產業立國論的提倡者山本，其見識和經驗是被公認為難得的人才，的確為內外所注目。首先，山本將原來的社長、副社長制改為總裁、副總裁制，其目的是，要對一向重視地位和體面的中國顯示威嚴。這雖然是件小事，但它說明了山本在中國的體驗和抱負。

山本在日俄戰爭前後，任三井物產會社中莊支店長，曾將滿洲的特產品大豆介紹到世界市場，到了滿鐵以後，在短短的期間內，他不但擴大了鞍山製鐵廠，以撫順的油母頁岩創辦人造石油和煤液化等事業，並且為建立鋼鐵的一貫作業，計劃設立新義州煉鋼廠。煉鋼廠在田中內閣辭職後，濱口內閣仙石（貢）總裁時代，曾被變更為以鞍山為其根據地的昭和煉鋼廠，但它的基礎還是建立於山本時代。

對於山本之不把煉鋼廠設在鐵礦產地的鞍山和煤產地的撫順，而把它搬到朝鮮一節，當時有各種議論。而山本本人則說：「滿洲既非日本領土，一旦有事，中國如果採取嚴正中立的態度的

話，鋼鐵將成為戰時禁制品，屆時日本可能無法利用。加以中國是世界上實施輸出稅的唯一國家，為增加其歲入，她不但可以隨意增加輸出稅，視中日關係的情形，亦可能賦課禁止的稅率。事實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曾遭遇到美國禁止輸出鋼鐵的困擾。但不管禁止輸出也罷，提高稅率也罷，比諸製成成品，原料遭遇禁止輸出的可能性比較小。考慮諸如這般經緯的結果，我決定把它設在新義州。」

根據當時奉天滿鐵公所所長（滿鐵的對外機關）入江正太郎的說法，有一個晚上，總裁來電話要他即時查報安奉線的輸送能力現況和輸送餘力；他報告對於一千萬公噸的輸送能力，現在祇有二百五十萬公噸的貨物，而這七百五十萬公噸的輸送餘力，乃是令山本即時決心採擇新義州案的原因。而由此，我們當可窺悉山本腦筋之如何清楚和熱衷工作的一斑。

### 大連會議陰謀侵華

山本總裁的見識和手腕，不僅在前述的產業方面，在政治和外交也有一番的表現。他抵達滿洲沒多久就前往北京，表面上說是要拜訪張大元帥，實際上抱着遠大的企圖。在滿鐵並行線和滿鐵包圍政策成為重點的時際，新總裁之跟張作霖談論鐵路問題，實在一點也不稀奇。關於鐵路的交涉，一向被認為是技術問題，並且大多由滿鐵本身去從事；而這種做法，比正式的外交交涉，既能避免問題的政治化，又能爭取獲得實質上的效果。

可是，山本不但提出建設新鐵路的問題，而且還提議兩個富有政治，經濟性質的重要協定案。這兩個案，都是與山本進入滿鐵的同時，由外務省通商局長轉職滿鐵的理事齋藤良衛起草的。擔任外交官的期間，齋藤幾乎全部主辦關於中國的工作，更被目為有關中國的諸條約——尤其是通商條約的權威。其所著「中國通商條約論」十卷，總共有一萬頁以上，其中有一篇「治外法權」論是他向東京大學申請，獲得法學博士學位的論文。它在外務省印得不多，並祇分送給各有關機關做參考，因此不大為人們所熟悉，但作為這方面的著述，是世界稀有的。

一九二〇年，齋藤在外務省上班中，受到憤慨拖延對中國政府支付賠款的日本人狙擊，一時生命陷於危險狀態。由於這種負傷，覺得自己生命不會太長的他，遂傾其多年的蘊蓄，一氣呵成寫就了前述的「中國條約論」十卷。而齋藤所起草的這個政治協定案，實出自跟日後「德日防共協定」同稱的構想，是為防止共產主義在滿洲的蔓延；「商定」滿日雙方協力的經濟協定案是以開放滿蒙內地，和實施所謂商租權為目標。

在以二十一條而馳名之一九一五年的「中日條約」，日本在南滿獲得商租權（以三十年為期限，並得無條件延期的土地承租權），自由居住、往來、行各種營業的權利；在東部內蒙古，獲致經營農業及附帶工業之合辦事業的權利；以這三種權利為代價，日本人約定要服從中國的警察權和課稅權。惟在實際上，除幾個少數例子外，它並沒有實施；所以日本希望運用這些規定，在

滿蒙達到日本和平發展與開發經濟的目的。

關於鐵路、防共和開發經濟的三個協定案，我相信山本事先已與田中外相商議過，但他却完全沒跟陸、海、外三省的事務當局商量；更對外交之第一線的總領事吉田一茂，（戰後出任首相），和對華外交的總負責人駐北京公使芳澤拼命保密。可是他未想到對方是最能玩要以夷制夷手段的中國政治家，尤其是有眼光及敏捷的楊宇霆（他是張作霖的參謀長），所以很能折衝和「討價還價」。

有一次，在一個茶會席上，楊宇霆曾就山本的提案委婉地對芳澤私下說：「這種事，除非由閣下親自向大元帥說，恐怕辦不到」，而故意攪亂日方內部。獲知這個消息的芳澤，隨即向田中外相發出責難山本的越權行為和其不協調的電報。田中於是遣派次官森恪到大連，招集本駐日北京公使館、奉天總領事館和滿鐵的首腦，疏通意見，調整諸懸案，協議並決定工作的各負責範圍；這就是當時衆所注目之大連會議的真相。

### 總領事不滿張大帥

關於鐵路問題，山本在北京期間，透過為人溫和，懂得中國語文，又有不少中國朋友的江藤豐二（跟森恪、中日實業公司的高木陸郎是三井的第一批中國留學生），和態度強硬的叮野武馬（張作霖的顧問），秘密地與張作霖談妥，張作霖正式答應吉會、長大（長春十大寶）兩線，其他兩條線也蓋了「閱了」的圖章，剩下的一條線，相約等回到奉天說服張作霖以後做再作決定。因

此鐵路問題仍然繼續將由滿鐵去處理。其他的政治問題在北京，滿蒙當地的諸案件則在奉天決定，分別由公使芳澤和總領事吉田去處理。

在東三省官場，一向有企圖進入關內的武斷派和主張開發東三省之文治派相對立。奉天省長王永江是文治派的領袖，他以保境安民主張，與武斷派的楊宇霆抗衡，集衆望於一身，但却為張作霖所不容，而終於隱居其故里金州，因此對於張作霖的野心，遂沒人可予抑制。

於此同時，多年來日本政府曾竭力於阻止張作霖進入關內，希望他專心經營東三省，總領事吉田尤其這樣主張。張作霖是俄日戰爭期間，脫離綠林以後，得到日本種種庇護而起家的。特別是郭松齡叛變之際，由於日本的干涉政策，張作霖纔得倖免於失敗；惟到了晚年，張作霖却以排日為能事，尤其插足北京政府；自稱大元帥以後，更眼中無日本，在滿洲送出排日事件。而在這些排日事件當中，最為內外人士視聽所注意的，就是對於日人在奉天所辦中文報紙「盛京時報」的「壓迫」。

日人在中國所經營的中文報紙，就其創刊歷史來講，遠比中國本身的報紙長久。由於多年來經營，它已具有穩固的基礎，加以享有治外法權，不受中國憲警的取締；因此能够自由而公開地從事迅速報導，擁有廣大的讀者，譬如發生與中國民衆利益息息相關的郭松齡叛亂時，它便是唯一報導真相，為中國人搶看的報紙。尤其是三浦梧樓將軍的侄子中島真雄所創辦的奉天「盛京時報」，和龜井陸良所手創的北京「順天時報」



，更具影響力。

當時「順天時報」是由大谷光瑞的高足渡邊哲信所經營；「盛京時報」的經營者是多年在上海主持英文報「中國水星報」的佐原篤介。主筆菊池貞二用做霜庵的筆名，在「盛京時報」所寫的社論，以篤實的筆法和明快的論點，就東三省的內政和外交，論盡民衆之欲言而不敢言，博得識者的稱讚。那時連載數天之題名「告字靈氏」的長篇社論，痛擊東三省的財政紊亂，民力的疲弊，和郭松齡叛變，語語刺入肺腑，而使膽大的張作霖、楊宇霆不寒而慄。總領事吉田與佐原和菊池是肝胆相照的朋友；由於「盛京時報」是推展吉田政策的最大原動力之一，所以張作霖遂禁止中國人購讀該報；對於其販賣和輸送，更採取阻礙手段。總領事吉田因此大爲憤慨。

### 多頭政治吉田掛冠

我於一九二八年九月到奉天履任後，立刻翻閱總領事館的重要文書，其中特別令我注意的是——題曰「對張警告」的那幾本龐大紀錄。內容包羅總領事吉田在奉天任職時，傾其心血與東三省首腦折衝的經過，和對日本政府上陳的意見；吉田欲打開日本對滿政策的用心，和努力躍然紙上。吉田的構想是令張作霖放棄插足中原，而專心於東三省的經營，以日本借款整頓因爲內戰和擴張軍備濫自發行奉天票而陷於紊亂的東三省財政，以此項借款爲代價，擴大日本的權益，由日本派遣財政顧問等等，並建議起用前大藏次官小野義一。

日本政府如果採納了吉田的上述意見，或許能避免了日後九一八事變的發生也說不定；可惜當時的幣原外相沒有理睬。愛憎之念很強的吉田的性格也反映於日滿的演變上，因此吉田與張作霖的關係，老是不圓滿，張作霖把吉田當做眼中釘。但阻礙吉田政策的推行者還有其他原因，那就是日本在滿洲的多頭政治。

詳而言之，除關東軍、關東廳和滿鐵等日方機關外，東三省官場還有日本陸軍遣派的土肥原（賢二），磯我（誠也）等現役軍人顧問，張作霖的私人顧問松井七郎預備少將和預備上校町野武馬。松井是日參謀本部第三部長松井石根少將的胞弟，跟參謀本部具有個人的特別路線，所以吉田政策很可能從這方面受到許多牽制。如此這般，日本對張作霖的態度，由於日方內部的種種理由，往往欠缺統一，因此吉田本身，遂不得不爲這種不統一而離開奉天。

### 軍部跋扈文官興嘆

參加過東方、大連兩個會議後回到奉天的吉田，以爲這兩個會議所決定方針的具體化，完全責成第一線去處理，所以他便於適當時機，爲警告張作霖，而欲阻止京奉線橫穿滿鐵線。由於一九〇九年日本在「有關滿洲五案件協定」中，承認京奉線可以延長到奉天城內，因此它便橫穿滿鐵線，並延長至城裡的兵工廠，而予專心軍事的張作霖以很大的便利。基於這一點，上述之阻止橫穿，對張作霖的確具有強大壓力的效果。但對於吉田的這個措施，關東軍却突然以他做得太過

份和太早而反對。

日本政府以關東軍既然不贊成，自無可奈何，因而沒有支背吉田；結果吉田對外立於進退維谷的苦境，而終於假借得病，暫時住進奉天紅十字醫院，然後以靜養的名目，回到日本。當年還不成熟的吉田，大概很想大顯身手一番的。不過那時他如果能事先跟關東軍和關東廳打個招呼的話，也許能夠緩和他們的反對；又以嘴吧壞而馳名的吉田，對於從國內去旅行者常常說：「要看不肖之徒，請到旅順」，這是挪揄關東長官兒玉（秀雄）的話，而這也助長了關東廳方面對他的反感。

這時，陸軍曾策動要由陸軍派遣後任總領事，但外務省却先發制人，起用駐暹羅公使林久治郎，林隨後於一九二八年春天到奉天接任。履新之前，林久治郎特向陸相取得陸軍將不獨自行動的字據，但日後滿洲問題的演變，證明它祇是一紙口頭支票。

（譯註一）第一次若槻內閣提出辭職不是一九二七年三月中旬，而是該年四月中旬，亦即田中內閣成立於一九二七年的四月二十日。

（譯註二）這是指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英國和美國的軍艦砲轟南京的事件。

（未完待續）

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本  
請撥電話七〇七二四八〇，  
即可收到書刊。